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

王岳川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

王岳川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王岳川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2001. 1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ISBN 7-205-04929-6

I. 本… II. 王… III. ①文艺 - 本体论 - 研究 ②文艺
学: 美学 - 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96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
辽海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丹东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0^{1/8}
印数: 1-2000 册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文海 刘宏元 版式设计: 丁 凡
丁 雁 丛立先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王晓秋

定价: 16.00 元

总序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争论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

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 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近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都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 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 80 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树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致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都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跟着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

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 6 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 年 9 月 9 日

自序

一

岁月匆匆，不觉已经人到中年。

这半生大致是“读书”与“写作”的交织。读书是铸造坚实的知识框架的重要方式。我在读书过程中，始而信，信而惑，惑而疑，疑而索解，解而终归大悟。我发现我曾经佩服过的一些中外学者，由于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满足于成为读书很多的“两脚书橱”，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甚至没能写成一部有思想创建性的著作。我意识到，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是相当重要的，然而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读书在尽可能的全面知识掌握中，以其思想的穿透力对其处身的时代进行深度反思。也就是说，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他能看了多类或某类书以后，在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的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他绝不屑于把他人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而且，他的博学仅仅是使得自己的思想大厦具有广阔的地基，从中拓展出一种原创

性体系。这才是真正的读书正果。

对我来说，读书首先是自我定位的前提。在读书时对一切神话话语和绝对真理保持怀疑态度，并对一切僵化的思想大胆扬弃，不懈地创造性重建自我的思想系统。学问是一个人内心涌出来的，或者是其内心深切感受到必须要解决的个体存在性（本体论）问题，并扩大到社会存在性问题和人类存在性问题才成其为问题。在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那些纯粹私人化问题往往貌似深刻而其实是假问题伪问题。我只能在问题成堆中尽量不断地校正自己，从而完成“从审父到自审”的学术转折。我意识到：面对多元文化语境，必得打破学术门户之见，打破固守所谓狭义的研究范围。排斥或丧失了新理论新思维，丧失了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要真正发现时代问题和更新知识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此，我这样给自己的“读与思”定位：读书方法定位、文化批判定位和思想价值定位。通过这一定位，我才有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学术意向。当然这纯属是我自己的个体学术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进入 90 年代，我的读书的意向性转为 20 世纪中西思想问题史的审理，并将“思”作为“读与写”的中介，而使得“读思写”尽可能统一起来。因为读书愈多，歧路愈多，思路愈险。90 年代读书，面前大多总有“网络”这个新客，读书的含义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的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于是，在商品原则和社会公正之间，触

发了个人化世俗化和公共领域交往原则的尖锐论战。在新的语境中，读书和思想当然就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

在思想催生的知识增长中，我明显地感到 90 年代具有一种非连续性权力话语更新的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话语权力杂糅史，即由多种理论、思想、意识的合力构成，由东方、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语境所构成。可以说，知识权力的相互制约，出现了各种知识群体、话语层次和思想学术领域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战。在这种复杂的不同往昔的社会网络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形态，关注知识分子自我的言述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谱系学的研究思想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时光匆匆，云卷水流，物是人非。读书仍然是我逼真的生命镜像，映照我的生命存在的踪迹。尽管所读之书的内容不同了，可那份宁静致远的心境依然。

二

写作也许是读书的孪生兄弟。

大致上说，我在 80 年代主要从事本体论研究，进入 90 年代主要搞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问题，并逐渐转向跨世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问题。

本体反思和文化批评是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的两种不同角度，本体反思是对生命存在的诗意思考，而文化批评则是从更为广泛的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处境的思考。正是这种力求向深度和广度的双向延伸精神意向，使我的思考尽可能同中国

文化身份和精神归宿联系起来，而西学则仅仅成为言述的一个背景而已。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写作的三个阶段，有其必然的联系：

首先，从事本体论研究。在 1985 年至 1988 年写了《艺术本体论》，并翻译出版了《文艺现象学》。对本体论的兴趣，源于我的生命体验，对生命中的生死问题的敏感使得我总想弄清文学与生命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一切西方大哲，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一切东方大哲，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都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面临最后一个根源性问题——生死及其意义问题。面对死亡，使语言变得已不那么重要，不管是语言游戏说，还是语言焦虑说，还是语言书写说，都仅仅是生命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维度，仅仅是生命所显示的冰山的一角，而不是它全部的风采。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脚下，在我们通过阅读和他者进行对话的领悟中。这些年我愈加回归内心，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著书立说，每日在壁立的书架前潜心读书，与大哲们交谈，感到充实而愉快。

其次，从事西学的研究。主要写作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 年）、《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1999 年）、《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1999 年）、《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999 年）等。对西学的关注源于我对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渗透和对话的多元性思考。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一个学者必不可少的思想操练。在这个地球村时代，无视西方思想的存在进而自我中心化，是注定要付出现代化的代价的。生命中的问题意识使得我不太注意那些时代风云中的文化泡沫，而是静下心来认真研究课题。那些表面上的论战和人为的造势，往往将学者引入歧路而难返本原。在与存在大限的“先行设定”之时，思想就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死文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对西学的研究，使得

我比较注重从与西方学术思想家对话的高度清理人类面临的前沿性问题，通过对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主要理论家的思想的审理和对话，进而从这些新的话语与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的关系层面，讨论“后学”文化思潮同当代文论的复杂关系，对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文化表征加以反思，勾画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冲突，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文艺思想发展的走向，尽可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站在 90 年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出现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思潮进行把握，对 21 世纪前夕的西方最新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以对中国 20 世纪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平行参照。

第三，对中国传统问题加以现代阐释和对当代问题加以文化审理（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中国哲性诗学研究》等。近几年，我在日本任客座教授，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读书，致力于世纪末的中国文化问题研究，文化研究成为我的学术关注点。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使得我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注重从问题出发，分别对中国 90 年代文化研究的意义、文化转型时期的数码复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边缘话语、当代诗人自杀的症候、先锋艺术的实验及困境、批评家的当代分化、大众传媒的形象消费问题以及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问题加以研究。注重探究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在现代性转型中怎样才能成为一种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新的发展的文化形态，探讨如何将东西方文化中有利因素加以有机地整合，

从而为创化新世纪人类的新智慧提供起码的个体和文本经验。我意识到：弃置全球文化政治经济镜像来谈中国政治经济镜像，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因为无论是问题的来源和结果，问题的转移和遮盖，都逃离不了全球化语境。只有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自我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思想者在话语转型的“苦难历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前沿性思考推进到新的高度。进而希望解决如下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华性”和“现代性”不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成为一种可以通约和互相对话的文化新形态？怎样通过每个个体的反思性努力，使当代文化不在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中一味滑向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而是成为一种注重“社会资本”的具有文化精神信仰底蕴的“价值文化”？而且，在学术研究中学者群体如何具有冷静的理性思考和对世界学术发展的正确认识，从而真正面对全球化思潮中的“自我身份”和“他者镜像”？可以说，这些网状般的问题，既是我学术研究的工作前提，也是我必得关注的当代现实问题的原初出发点。

读书与写作，是对意志的磨炼。经年累月的深夜读与思、思与言，使我领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或许，读书使我与历代大哲面对同一精神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写作可以使那稍纵即逝的思绪得以留存。

是为序。

王岳川

2000年9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上编 文艺本体反思

本体论演进与文艺本体论嬗变	3
当代西方美学的核心问题	43
艺术超越性的时空维度	86
文学接受的主体性建立	98
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	113

下编 文化批评之维

90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	151
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	172
全球化语境中的后现代后殖民问题	190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香港	214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台湾	248

在思想拓展中超越“后学”话语.....	286
附录：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301

Contents

Preface	1
Author's Preface	1

Part One: Reflection on Artistic Noumenon

Evolution of Ontology and Artistic Ontology	3
Core Problem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4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 of Artistic Transcendence	86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Reception	98
Analysis on Cultural Syndrome of Poet's Suicid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113

Part Two: Cultural Criticism Dimension

Internal Problem of th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90s ...	151
Method and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72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190